

王世贞的 六次镇江之行

□ 刘俏到

京杭大运河自南逶迤而来,脉脉一线引入长江,再一路向北入京。千百年来,镇江据此十字黄金水道,成为重要的水陆要津,涵养着江南古城独有的羁旅意象。所谓“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江海街拥之地,东西南北之交,聚散离合之际,进退去留之事,都将为途经镇江的文人士子平添无限的心潮起伏意难平。明朝文史大家王世贞,就是其中之一。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朝中后期文学复古运动的旗手、文坛盟主。他一生亲历严嵩得势与失势,父亲死于严党之手,南来北往经受无数变故曲折,对于京杭大运河和镇江这个“十字路口”,有着更多难以言说的体验。

年近天命之时,王世贞曾言:“吾家太仓去神都,为水道三千七百里,自吾过舞象而还者十二,而水居其八。”其中,“舞象”是成童之年,这个说法指其17岁首次北行之事。而“水居其八”仅指水路经镇赴京而言,如加上经镇赴其他城市,则驻留这个“十字路口”次数更多。屈指盘算,值得一书者至少六次。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冬天。时年21岁的王世贞,冬季出发赴京,参加第二年春天会试。船到镇江后,王世贞作诗留念:“金陵望中山抹烟,铁瓮城头浪拍天。居人尽说风波恶,江口何时不放船。”自江南运河行来,一路风平浪静、野阔天空,到镇江突见水面宽广、波涛翻涌,心头自是起伏不定。实际上,这是王世贞二番应考。两年多前他落第归乡,一度肆意诗酒,貌似自暴自弃的模样。父亲王忬免不了一番语重心长,王世贞才“俯首故业”继续备考,为此行打下基础。好在三四个多月后,王世贞即以第八十二名的成绩高中进士,且在京城文坛立显。

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时年王世贞42岁,距离会试高中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二十年来,对王氏家族而言,堪称惊涛骇浪、物是人非。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王世贞和李攀龙一起广泛交游、力倡文学复古,成为“后七子”中坚,崭露头角,风头角。他京内京外奔忙,治刑统兵有方,留下政声响亮。而在著名谋臣杨继盛挑战严嵩时,他拒绝严党拉拢,杨继盛遇难后,王世贞之父王忬也遭严党弹劾落狱,最终问斩于市。王忬遇难后,王世贞自认“罪人”,痛心隐居太仓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隆庆元年正月,王世贞途经镇江,目的便是进京向新帝申冤。他留镇数日并写下《重登金山作》两首,其中不乏低沉之言,如“凭陵不尽千秋语,辽落长悲六代才”,但严冬之际他也有爽朗向阳之语,如“春山春望郁葱葱,结首扶桑黛色开”。而“振衣还上妙高台”一句,分明想将六年郁结一扫而开,对赴京之行颇有期待。王世贞此行诗中,还有“屈指旧游君莫负,十年吾岂愧渔樵”之语,似指重游镇江已是前尘往事。确实,过去二十年间,他数经此地巡办公务、回乡省亲乃至扶柩南归,只不过往事不堪回首,不必赘言。

隆庆四年(1570年)六月。这年李攀龙逝世,45岁的王世贞从此“独掌文盟二十年”。父亲王忬已于三年前平反,王世贞走出家难阴影,获缺赴任山西按察使之际,他照例经水路离家,六月二十四日抵镇,再游金山焦山。游焦山时,王世贞起了个大早,五鼓时分观新月。“焦山月出垂五更,呼樽起酌逸兴生”,有酒有月,雅兴十足。“偶从缺云见铁瓮,几欲腾空凌玉京”,这是凌晨席上望见城内的风景。“人间好景不易再,况乃别思催纵横”,千里赴任自然舟车劳顿,可惜这朝廷偷官说走就得走。游金山后就地小聚,朋友自城内取送好酒,等候之际写诗作乐,道是“倚阑兴剧跨京口,忽有扁舟送好筵”,佐证当时金山犹为“江中浮玉”,与岸相离。二十七日,王世贞离镇北行,别时诗云“岂必耽微禄,浮生本末期”。

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时年王世贞48岁,母亲去世,丁忧期满,他受命再度走南闯北,三月复用为湖广按察副使,要求七月到任武昌。王世贞六月初七登船启程,十七日抵镇,而武昌接应船只已提前一天到达。抵镇当天,大家在金山摆了酒性祭江,一并宴别。欲问王世贞心情如何,其日记写着“登绝顶,怅望久之”。十八日船离镇江,溯长江西行,这在王世贞旅史里或属首次。王世贞写道:“楚歌一声发,吴佐直泪涟;武昌应尚远,船是武昌船。”他一向多写律诗,这次却写了一首五绝,短短四句之中,有着说不尽的心累。

万历二年(1574年)二月。王世贞出任武昌后,当年底又还家。休整月余,即于次年北上赴任太仆寺卿。再次经过镇江,虽然距离上次不足一年,但却办了一件文史留名的大事。经行运河北上多年,王世贞早已感慨万千。这次他邀老友画家钱穀上船,意图以太仓至北京的水路为题材,绘制一套纪行实境山水画册。这是个宏大构想,落实并不容易。最初钱穀欣然随行,一路绘就太仓至镇江、扬州计三十个场景。可67岁的钱穀确已体力难支,于是“十字路口”以后的行程由弟子张复跟进,又得图五十幅,统归钱穀润色。这就是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水程图》。而对镇江而言,王世贞此行亦颇具意义。因《水程图》中,有吕城、丹阳、辛丰、丹徒、夹岗、京口、扬子江、金山焦山等多个场景。以图幅数量计,今属镇江者占全图十分之一,且均由出手老辣的钱穀一手绘制,实可谓万历年间镇江山水形胜之直观佐证,极为难得。

万历十八年(1590年)三月。自上次经镇赴京,王世贞又曾赴邵阳、南京短暂转任,期间屡被弹劾,愈加厌倦思退。他年事已高,身边亲人或亡或凋,他倍感寥落,归心似箭。万历十七年,他竟又等来升任南京刑部尚书的谕旨,遂连续三次“以病乞休”,幸得同乡王锡爵斡旋,于次年三月获批。得讯可以归乡,65岁的王世贞满心欢喜,“恨不能即时奋飞,次晨即发”。返家时必然过镇,丹徒名士陈从训闻讯相迎,送至丹阳。分手时王世贞欣然赠诗:“老夫抖擞金陵尘,劳生远送情更真。报汝余中自天地,明年共赏糟丘春。”陈从训是万历年间江南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写得一手好字,与董其昌、于慎行等亦有交集。王世贞赞他“京口三山产三杰,中有陈生擅三绝”,又约他来年太仓弁山园再会,可惜这已无法实现。

自镇返家后,王世贞身体每况愈下,十一月安然病逝。从前他曾感慨经运河北行一路,“得失忧喜之事,错或接渐下夜,所经踪都会繁盛,若云烟之过眼而已”。到如今,他总算走完一生的十字路口,再也不用纠结与回头。

“金山”和“金山寺”的得名时间及“白蛇”传说的起源

□ 乔长富

今天,说到金山,人们往往会想到“裴头陀”拾金的传说;说到“金山寺”,人们大概都会想到金山的江天禅寺,并且还可能会想到历史上金山的净心寺、龙游寺之类。但是,这些“金山寺”只是历史上金山所建寺庙的泛称。那么,作为金山所建寺庙专名的“金山寺”又是始建于何时呢?对此,人们未见有具体说法。今天看来,个人以为,它当是始建于唐代金山得名之后。请看以下事实。

“金山”的得名时间

其一,历史文献表明,古代的金山本来是称“伏牛山”“氏父山”,直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6年)才被赐名“金山”。

唐太宗时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卷八引南朝山谦之《南徐州记》称:“蒜山北江中有伏牛山。”清代杨荣《京口水记》称此伏牛山是指金山。唐代李吉甫撰成于元和八年(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称:“氏父山,在县西北十里。晋破苻坚,获氏贼,置此山上,因以为名。今土俗亦谓之金山。”“今土俗”句当取材于贞元二十一年之前的记载,《光绪丹徒县志》“金山”所录南唐僧人《头陀岩记》称:“贞元二十一年,节帅李筠奏闻,赐名金山。”这些记载表明,“金山”在唐初以至盛唐时还称为“伏牛山”和“氏父山”;金山正式被称为“金山”,是在金山被赐名“金山”以后,至于赐名“金山”的原委,今天看来仍有待探索。

从唐人诗歌看,初唐和盛唐,甚至到中唐前期,都不见有“金山”诗;在“氏父山”被赐名“金山”以后,唐人诗中才见有“金山”诗。例如,中唐窦庠有《登金山》诗,庠序是元和三年(808年)开始为浙西观察副使,此诗当是作于元和三年或稍后。又如,李绅在大和七年(833年)前后曾在润州,他作有《忆万岁楼望金山》,当在这段时期以内。这两首诗表明金山在被赐名“金山”以后,金山的名称才逐渐流行于世。

金山得名“金山”的时间,综观前人记载,有三种说法。一是李吉甫说“今土俗亦名金山”。二是《头陀岩记》所载“贞元二十一年”说。三是裴头陀“拾金”说。三种说法中,从唐人诗歌看,当以“贞元二十一年”说为可信。至于李吉甫说“今土俗”云云,似乎在元和八年《元和郡县图志》成书时才有“土俗”称“金山”,表面看来似与《头陀岩记》所说相矛盾。其实,今天看来,李吉甫之所以在时说“今土俗”而避开李筠,当是由于李筠在元和二年(807年)谋反被杀。李吉甫因说“今土俗”称“金山”,证明“金山”在建中四年已得名“金山”。此外,论者举《旧唐书》“韩混传”载建中四年(783年)韩混“以兵三千临金山”,“证明‘金山’在建中四年已得名‘金山’”。其实,该传说只是后人追叙其事,也不能证明建中四年已称“金山”。至于裴头陀拾金说(详下)明显错误,更不足为据(详下)。总而言之,《头陀岩记》说贞元二十一年“赐名金山”说,应该是可以信从的说法。



文徵明《金山图》

“金山寺”的得名时间

从唐人诗歌看,氏父山在被赐名“金山”以后,建于金山的寺庙才被称为“金山寺”,并知名于世。这个“金山寺”应该是唐代建于金山的有关寺庙的专称。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唐人诗中,在金山得名之前,并未看到有“金山寺”的名称。在金山得名之后,在《全唐诗》所录的唐人诗中,才看到张祐有《金山寺》,许浑和马戴有《送僧归金山寺》,刘沧、杜荀鹤、孙鲂、韩垂等有《金山寺》诗。而且这些诗中并没有一首显示金山寺是建造于金山得名之前。至于李翱《金山寺》称“万古波心寺”,“万古”是指长江而言,并非指金山寺。孙鲂《金山寺》称“千载江心寺”,也只是夸张说法,并非实指。由此可见,金山之有寺庙,当是在金山得名之后。至于《至顺镇江志》卷九“龙游寺”(即金山寺)说“梁《高僧传》:天监四年,武帝临净心寺,设水陆会。”但从梁武帝所撰“东巡记”看,他虽曾在称帝以后到过京口,但未见有“临净心寺”的记载。而且,《梁书》“武帝纪”及慧皎《高僧传》都不见这一记载。可见《至顺镇江志》所说缺乏根据,并不可信。总之,“金山寺”的建造,当是始于唐代在金山得名之后。退一步讲,金山之寺称“金山寺”,也只能是在金山得名之后。

在镇江战斗过的四位志愿军军长

□ 孟宪威

级战斗队,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唯一一次成建制歼灭美军团级以上部队的模范战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十三军军长:钟国楚

钟国楚1912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闽赣省军区独立第八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坚持闽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9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茅山地区成立新四团,钟国楚任副团长。5月率新四团第三营参加句容赤山战斗,此战毙伤日军130余人,俘2人,缴获日军九二式步兵炮1门。这也是江南新四军首次缴获日军大炮。陈毅、粟裕率新四军主力北渡后,钟国楚留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历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政委,第十六旅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六旅旅长、副旅长,苏浙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1952年9月钟国楚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二十三军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东海岸防御作战、驿谷山南北两岸防御作战、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其中丁字山防御作战成为志愿军阵地防御的模范战例。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十一军军长:吴咏湘

吴咏湘191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湘鄂赣军区独立营营长,坚持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营营长。1938年6月随部挺进苏南,在句容、江宁、溧水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后随第一团调回皖南。1943年4月再次回到苏南工作,任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团长,参加茅山地区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1953年3月吴咏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东海岸防御作战和金城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

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二十二军代军长:廖政国

廖政国1915年出生于河南罗山。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副团长、代团长、兵站站长,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延安调新四军工作。1938年10月随部挺进苏南,在句容、镇江、丹阳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句容白兔战斗是第六团在茅山地区的较大战斗,新四军与日军激战长达六个多小时,廖政国指挥部向日军发起多次猛烈反击,打开一条血路,使战局化险为夷。在高庙战斗中,他率领第二营在句容至丹阳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缴获大量物资。1939年10月,管文蔚、叶飞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扬中编成独立,廖政国任第一团参谋长。

1950年11月廖政国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二军副军长,率部入朝参战,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1951年5月任第二十军代军长,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指挥著名的华川阻击战,保障了东线部队的顺利北撤。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白蛇”传说的起源

以上是说对金山和金山寺得名的一些看法。下面说说与金山有关的白蛇传说的一些看法。白蛇传说是我国著名的民间传说,它与金山和金山高僧有重要联系,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对于这一传说与金山的联系,人们大概都只会想到法海,而不会想到灵坦。其实,从相关记载看,个人以为,这一传说当是起源于灵坦传说,法海只不过是后来成为传说中的“主角”之一而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早在北宋赞宁所撰《大宋高僧传》卷十《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之中,我们就看到了白蛇传说的记载:“释灵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则天太后侄孙。……(大历以后)又止润州江中金山,今泽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龙穴,常吐毒气如云。近者多病,或毙。坦居之,毒云灭迹。又于江阴定山结庵。俄闻有赞叹之声。视之,则白龟二。坦为受(授)戒。……却往吴兴。……元和五年,相国李公郣之理广陵也,……一见坦,郑重加礼,召居华林寺。”从这一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与白蛇传说有关的两个情况,一是“龙穴”,当即与白蛇传说有关的金山白龙洞。二是“二大白蛇”。白蛇事虽发生于江阴定山,但此事紧接灵坦居金山之后,因而也与金山发生了联系。从这种情况看,白蛇传说发生的地点和主人公“法海”以及白蛇和青蛇的“影子”,已出现在“灵坦传”之中。据此,今天,可以认为,白蛇传说的起源,当是与灵坦有关,时间在唐代中期。

说到这里,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这就是:金山既然在南北朝时期已有“氏父山”之名,为什么当时以至盛唐以前是默默无闻,直到中唐时期才崭露头角呢?这个问题,论者似乎未见论及。今天看来,金山之所以会在中唐开始逐渐知名于世,当与唐代开元年间润州刺史齐澣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当时属于润州的瓜洲开凿伊娄河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有关。之所以如此说,是由于伊娄河开凿以后,从而使扬州与润州间本来由扬子津抵达京口的主航道发生变化,使得本来远离扬子津至京口的主航道的金山,置身于从瓜洲到京口的主航道之间。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地处关中的唐王朝更加依赖东南地区,京口到瓜洲的交通更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地处润州与扬州之间长江主航道之中的金山,自然也会越来越知名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和更高的知名度,从而由一个本来因禁战俘的江中小岛,发展成为江中“浮玉”;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寺庙,发展成为声名远播的“金山寺”。

